

试析 1860年 ~ 1914年间的赴俄华侨

李志学

(暨南大学文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32)

[摘要] 19世纪60年代后, 华侨大量涌入俄国远东地区佣工、谋生, 大规模的赴俄移民潮开始形成。致使俄远东地区成为近代华侨移居国外的热点地区。赴俄华侨以山东籍为主, 为俄远东地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劳务, 加速了该地区的农业、采金业、铁路修筑等经济开发与建设。

[关键词] 俄国华侨; 远东地区; 经济开发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5072(2006)01 - 0117 - 05

1860年, 中俄《北京条约》签订, 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及乌苏里江以东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并入俄国版图, 该广大区域成为俄国远东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的阿穆尔省和滨海省与中国山水相连, 大量华侨赴此地谋生, 大规模的赴俄移民潮于19世纪60年代后开始形成。

一、华侨赴俄之原因

在关内人口膨胀、自然灾害频仍、封建剥削和列强入侵的逼迫之下, 百姓生活困苦不堪, 饥鸿遍野, 流民塞途。清政府为缓和社会矛盾, 同时出于“移民实边”的政治考虑, 1860年, 宣布关东向流民开放, (1860年, 黑龙江省开禁, 1885年, 吉林省开禁, 1903年东清铁路通车后, 东三省全部开禁。)流民入关, 不再视为非法。于是, “流民出关觅食, 势若河决, 滔滔不可复止。”^{[1][122]}其中相当多的一部分流民进入东北后, 继续北上, 越过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到俄国的远东地区佣工、谋生。

1860年后, 俄国加紧了对远东地区的经济开发, 建设城镇、铺设道路、修建港口、创办工

厂、发展农业, 因而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要从遥远的欧俄省份补充, 不但费用过高, 花费的时间亦长。而从相邻的中国招募劳工则事半功倍。于是, 俄国政府和企业纷纷到中国招募大量的廉价华工, 以补充该地区劳动力的严重不足。

内“推”与外“拉”的两大因素, 使俄国、特别是俄国的远东地区成为继东南亚和南北美之后近代华侨移居国外的第三个热点地区。

二、赴俄华侨之概况

华侨之籍贯: 在19世纪60年代至一战爆发前的半个世纪中, 赴俄远东地区佣工的华侨主要来自山东、东北三省以及河北、山西、陕西、内蒙古等地。其中以山东人为最多。凡是外出佣工之人“几于无地非山东人也。”而在外出佣工的山东人中赴俄者又最多。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 山东每年到东北和俄国佣工的人多达35万, 而其中的相当大一部分是到俄国的。据1907年烟台海关的记录, 从这里赴俄佣工的苦力就有六七万人。^{[2][93]}考其缘由, 山东省是当时中国人烟最为稠密的地区之一, 人地矛盾最为严重, 加之黄泛及其他自然灾害频发, 百姓度日

[收稿日期] 2005 - 05 - 13

[作者简介] 李志学(1954—), 男, 辽宁朝阳人, 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从事中俄关系史研究。

[基金项目] 国务院侨办科研项目《俄国华侨历史与现状的研究》(编号: 03QQB YB001)。

如年,逃荒现象十分普遍。有关俄罗斯远东地区容易找活干的传闻在此不胫而走,于是,该地区便成为山东人出外谋生的一个理想目的地。

赴俄之路线:以山东人为主的赴俄华侨所行之路线有两条,一为陆路,由北宁铁路出山海关进入东三省,然后转入俄属东海滨省、阿穆尔省及西伯利亚一带。一为海路,由青岛或烟台(河北山西等地华侨自天津港)乘船至海参崴或转入俄远东其他各地。^{[3][346]}地处渤海之滨的芝罘(烟台)是当时赴俄华侨的主要集结点。

赴俄华侨之人数: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的第一批赴俄远东地区的华侨见诸记载的在 1870 年。“俄国之远东经营需用劳力孔多,以 1870 年由直隶及山东招募中国苦力百五十人为始。华工年龄“自十八岁起至三十岁左右者为多,老人甚少。在大战前妇女之乘轮至海参崴者渐见增加,可见男子永住者之如何激增。”^{[4][15]}以远东地区的乌苏里边区为例,看当时华侨大规模迁移俄国佣工的情况。依据俄国总参谋部中校纳达罗夫在 1882 和 1883 年到远东乌苏里边区进行考察后所提供的华人统计资料:1860 年,乌苏里地区有中国人 872 人。(这是俄国未割占此地前即已定居的中国人。属“割地成侨”的部分。)到约 20 年后的 1879 年,乌苏里地区的中国移民达到 6856 人。(其中男性 6698 人,女性 228 人)加上原住民,该地区的华侨总数达 7728 人,20 年内增长了 6.6 倍。(男性居民)如按地区看,绥芬区增长最快,高达 26 倍。而处在绥芬区内的符拉迪沃斯托克, (海参崴) 1860 年时仅有 2 个中国人,到 1879 年已有 1196 人。至 1885 年,乌苏里地区的华侨居民数已达 10353 人。其中海参崴市已增至 3000 人。(1884 年)此时该地区的俄国人口数包括军队及其眷属在内总计为 3 万人左右。俄国人与华侨人口比例为 3 比 1,如果加上该地区中国人的流动人口约 4000 人在内,该比例为 2

1。就是说,此时期乌苏里地区的人口有一半是华侨。^{[5][90~112]}从整个俄远东地区的阿穆尔省和滨海省看,到 20 世纪初的 1906 年至 1910 年,经海路陆路进入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华人有 55 万左右,平均每年流入 11 万,返回者计 40 万,称之为“候鸟华工”。其余 15 万人滞留俄

境,成为常住的华侨。这是前沙俄政府外交部特派员戈拉韦在专门考察远东黄种人问题时所提供的数据资料。^{[6][121]}另据中国学者李长傅先生根据俄国驻烟台领事馆提供的数据,自 1906 ~ 1910 年的 5 年间,赴俄远东地区的华侨总数为 155078 人。^{[4][15]}中外资料对比,到一战爆发前的 20 世纪初,约有 15 万常住华侨谋生于俄远东地区的这一结论是可信的。

赴俄远东地区佣工的华侨,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很少加入俄国国籍,当时被称为“国际游民”。

华侨职业之划分:此时期赴俄华侨所从事的职业是多元的,可谓囊括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工农商各业皆有华侨在劳作。1910 年出版的《阿穆尔的黄种人》一书记载了 1897 年阿穆尔省与滨海省中国人的从业情况。两省华侨从业综合比例如下:农业 44.6%,仆役、日工、杂工 42.4%,矿工、采石、伐木 21%,建筑工 21.3%,木材及金属加工 5.8%,经纪人、商人、酒店主 21.2%,铁路船舶工人(滨海省)4.3%,其他行业如酿酒、运输、捕捞、皮革制造、渔业等亦有大量华侨劳作其间。两省综合比例约在 45%左右。^{[7][5]}

上述资料表明,一战前的赴俄华侨所集中从事的行业为农业、服务业、建筑业、商贸业及矿山开采、伐木等。华工所从事的大多都是艰苦而笨重的劳动。戈拉韦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中国人、朝鲜人、和日本人》一书中写道:“这些中国苦力,作为采金工,他们充满了泰加森林;作为农工,他们遍布乡村;作为工厂苦力和房舍、工程的建筑工,他们充斥城市;作为修理工,他们走街串巷随处可见;作为装卸工和水手,他们活跃在码头和小汽船上。总之,他们工作在所有需要笨重体力工作的地方。”^{[6][121]}

三、赴俄华侨的社会地位

“黄祸论”的受害者。沙俄政府一方面急需廉价华工开发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一方面又出于民族的、政治的、甚至是国防的考量,特别是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大量华工涌入俄境后,“黄祸论”开始甚嚣尘上。俄国无政府主

义者巴枯宁于 1873 年出版了他的《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一书,就开始大肆宣扬来自中国的危险。他说:“有些人估计中国有 4 亿人口,另一些人估计有 6 亿人口,他们十分拥挤地居住在帝国境内,于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以不可阻挡之势大批向外移民……转眼之间,西伯利亚,从鞑但海峡到乌拉尔山脉和直至里海的整个地区就将不是俄国得了。”^{[6]124, 125}上述谈到的俄国总参部中校纳达罗夫于 1885 年 12 月 12 日在阿穆尔边区研究协会所作的报告中说道:“鉴于政治的原因,鉴于乌苏里地区应该具有纯俄国的面貌,我们丝毫不欢迎乌苏里地区的蛮子居民(中国人),蛮子离开乌苏里地区愈快,该地区的俄罗斯化也就愈迅速。”^{[5]119}曾在日俄战争期间担任俄国远东对日作战部队总司令的库罗帕特金在其《俄中问题》一书中说道:“我们的远东边疆在中国化,俄罗斯在亚洲大陆的处境如此令人担忧,俄罗斯不得不等待着中国将整个阿穆尔沿岸地区从俄国手中夺走,并且将俄国赶到贝加尔湖以西。”^{[8]135}在“黄祸论”的鼓噪之下,沙皇政府和远东地方当局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限制、排挤、甚至迫害华侨的政策措施。具体表现为:第一,向远东地区的华侨加倍征收各种名目的税收。特别对华工所需衣食等物课以重税。据宣统二年(1910 年)清政府驻海参崴总领事桂芳递呈外务部的报告中说:“据崴埠华商总会禀,为华工所需衣食等物税重价昂,顿至华工不能自贍,日形困顿,谨拟具节略恳请转达俄户部照准减免税额,以示体恤华工,而利雇佣等情。”^{[9]1806}第二,假各种名目,如防疫、卫生、住所、从业等加以种种规定与限制,以达排挤华工之目的。如 1905 年冬天,“哈埠鼠疫蔓延。于是,假名防疫,水陆口岸及沿边一带禁绝华民入境。今虽鼠气已消,犹不尽弛前禁。”“假卫生之名,凡居住不得狭隘,门面必须装潢,衣服必须整洁……居室一端,室内面积每人必须占二立方沙绳。(一立方沙绳宽、广、厚各约华六尺六寸)然住崴俄人居室,每人所占容积不及二立方沙绳者甚多,俄官并不过问,独于华商则勒令依照,违者科以重罚。在华侨从业方面,“所有(俄商)雇佣之华伙,均勒令减少……向来渔猎、农佃、砖窑、车脚、操驾、篷船,华

人皆得操业为雇。近来禁止华人一切渔业,又禁止猎户打貂……砖瓦一项为工厂之要需,每年约费十万卢布之价。大半为华人窑工所吸取。近来一概封禁,不准华人烧埴……又驭车、运货、俄领海沿岸行使篷船诸项皆禁华人操业。”^{[10]42, 43, 44}第三,以查验身份为名,拘捕迫害华侨。宣统三年,(1911 年)东海滨省总督令海参崴总巡厅总办列鼎格查拿在崴埠华侨。“凡华侨无正业、无身票、及匪类不安本分者,均应拘拿解送回华。该总办遵行之下,即派巡兵等,沿街寻获,毫无章法,被拘者多有正业。”“总办严飭巡兵,团围市场,所有荷担携篮小贩,乃为俄厨役赴市买物,或在市应雇之荷夫,即俗称高丽背者,无论有票无票,一概逐拿,接连发辫,牵扯驱行,凌铄之情,不堪言状。”“总办分飭巡兵,围守居住华人稠密之房屋,或于楼房、或于院落,无论有无眷属,小卖营业,一并搜查牵拘,以致被拘者之财产,损失抛弃,甚于被盗。在 1911 年中,海参崴出现上述三次拘拿华侨事件,约共两千余人。将被拘拿之华人置于容量不及千人的叶尔马克轮船上,达两昼夜之久。华侨受伤毙命者多名。”“穷极残酷,实欲陷华人于死地。该总办对待华侨种种行为,甚于对待囚犯,实为外交上法权之所无,即俄人视之,亦多有抱不平者。”^{[9]1809, 1810}至于 1900 年沙俄政府借义和团运动之机制造的“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大肆屠杀中国人,更是惨绝人寰,罄竹难书。

2 业主与工头盘剥的对象。华侨赴俄佣工,皆因国内生活困苦所迫。至俄后,他们又成了当地企业主与工头盘剥的对象。从工资待遇看,“华俄工之间,相差甚远,华工之工资不过俄工之七成或五成耳。”^{[4]31}资料记载,“在整个俄罗斯远东地区,华工与俄国工人的日工资几乎相差一倍。在滨海省,中国力工的日工资在 70 戈比至一卢布之间,俄国力工的日工资则在 1 卢布至 1 卢布 60 戈比之间。中国木工和石匠的日工资在 1 卢布至 1 卢布 60 戈比之间,而俄国的木工和石匠的日工资为 2 至 3 卢布。”^{[6]122}正因为有大量廉价华工的存在,给俄远东地区各行各业的企业主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如李长傅先生所言:“俄工耽于酒色,不循规而贪懒,工

资过高。故勤勉而贱价之华工,颇受人欢迎。^{[4]29}此亦是上述俄政府与地方当局欲驱逐华工而不能遽行者之故。“欲求工价廉而工效速,用俄人实不如用华人。”^{[10]44}除低廉佣值外,华工还受到各类工头的盘剥。华工唐强山是包工头尤文在沈阳招募的 1500 名华工之一,招工时讲妥,到俄国后每开出一俄亩土地给 3 个卢布,但实际上只给 1 个卢布。而且还要从中扣除手套费、鞋费、短棉大衣费、铁锹费……包工头还赚华工的伙食费,卖给华工的大米高出正常价格的 3 倍。唐强山等人干了一年,在包工头的剥削之下,未能赚到钱。华工姚信诚被俄国人招募到加林诺采伐森林,规定每“古帮”(一丈长,五尺高,三尺宽)木 8 元“羌帖”,(卢布)但俄国包工头扣 3 元,“大柜”扣 0.25 元,“通事”(翻译)扣 1 角,验收员也要扣钱,扣来扣去,每个工人每天只能收入 9 角左右。^{[7]8,9}俄国学者索洛维约夫在《资本主义时代在俄罗斯远东的华工》一书中评论道:“华工处于双重压迫之下。一方面,他们遭受着俄罗斯企业主的剥削;另一方面,他们又遭受着把头的剥削。这些人以中国主人的身份榨干了华工的血汗,他们在十分艰辛的条件下生活、劳作。”^{[6]123,124}华工在俄罗斯业主及工头的剥削与压榨之下,其生产、生活状况十分凄惨。俄国人称华工谓“老伯代”。(苦力)俄罗斯人不愿做的苦活、累活、脏活都由华工劳作。以采金华工为例,他们在矿场从事繁重的手工开采,从早晨 5 点一直工作到晚上 8 点,只是在下午 2 点有半个小时的便餐时间。10 至 12 人组成一班,住在又脏又窄的小工棚里。^{[6]121,122}在伐木场,200 名华工住在一个大工棚里,空气污浊,跟狗洞差不多,工人们日益贫困,冷天还穿着草鞋,蓬头垢面,与叫花子没有两样。本来以为到外国可挣点钱,其实天下老鸦一般黑,不仅受资本家的气,还加上民族压迫。^{[7]9}

四、华侨对开发俄国远东地区的贡献

此时期的赴俄华侨在艰辛困苦的异国他乡为俄远东地区的经济开发作出了巨大贡献。

为俄远东地区的社会生活提供了不可或缺

的各种商品和劳务。用俄国人自己描绘的当时阿穆尔沿岸地区的情景是:“到处都可以见到中国人,到处都可见到中国人的商品,人们住的是中国人盖的红砖房子,用的简单的器具都是中国的工匠生产的,喝的是中国人的茶叶,吃的是中国人生产的面粉和蔬菜,家庭所需的一切日用杂品都得到中国开的店铺里去购买。这些店铺几乎遍布大街小巷的十字路口……总之,在这些地方离开中国人就寸步难行。”^{[2]93}

加速了俄远东地区经济开发的进程。第一、农业开发方面;如上所述,赴俄华侨的相当大一部分从事农业生产。陈里特在《欧洲华侨生活》一书中指出:“华侨以农为业者,俄国最多,法国间有之。”^{[11]182}自 19 世纪 60 年代东北开禁后,就有大批中国人越过黑龙江、乌苏里江来到远东地区从事农业垦殖。1897 年阿穆尔省有中国人 11160 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占 33.1%。滨海省有中国人 31157 人,从事农业生产的占 11.5% (此地从事农业生产的朝鲜人居多)^{[12]18}务农之华工绝大部分是在国有土地上劳动的无契约农民和佃农。他们“不望休息,不耽于酒,安于低廉工资,颇受该地农家欢迎。”“欧洲大战前,在农业中心地方及黑龙江沿岸地方遂为重要劳动者,尤其在毛路干派教徒及其他居住之村落占农业劳动者之大部分……农业之进步,事实上所赖于中国人及朝鲜人之处诚非浅也。”^{[4]28}在务农华工集中的阿穆尔省,从 1901 ~ 1905 年到 1911 ~ 1915 年,该地区的播种面积增加一半,从 40 万俄亩增加到 60 万俄亩。^{[8]159}农业开发所取得成就浸透了无数华工的汗水。第二;采金业方面;采金业是华侨赴俄佣工的主要去处。19 世纪 50 年代以前,俄国黄金开采地主要集中在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占全俄黄金产量的 85%。随之远东地区,特别是黑龙江沿岸、乌苏里江沿岸金矿的发现与开采,从 19 世纪 60 年代后,西伯利亚和远东的黄金开采量一跃而居全俄首位。据统计,到 1910 年,阿穆尔省和滨海省正在开采的金矿有 343 个,产值 950 万卢布。^{[6]122}来此采金的工人绝大部分是中国人。在 1906 ~ 1909 年的 4 年间,采金华工总计达 50865 人。^{[4]31}1910 年,华工占采金工人总数 82.3%,到 1913 年上升至 87.6%。

黄金开采业是沙皇俄国资本积累的极大源泉,所以,就采金言之,华工为俄国的资本积累作出了重大贡献。第三、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在俄国华侨史上,这是值得大书而特书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西起乌拉尔山东麓的车里雅宾斯克东至弗拉迪沃斯托克,全长 13 380 公里,是连接欧俄与太平洋沿岸的世界最长的铁路。西伯利亚大铁路于 1891 年从东西两端同时破土动工,原计划使用俄国工人,为的是不使利权外溢。但从欧俄地区招募来的俄国工人因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很快纷纷逃离工地,使用日本工人的计划亦因工资过高而未实现,俄政府最后决定从 1892 年起全部采用华工和俄国流放犯。^{[2]1504}华工主要来自山东,每年春季来临时,满载着山东劳工的轮船自芝罘起碇,驶往符拉迪沃斯托克。有些年份人数高达一万多。中国劳工奋战在铁路建设的各个角落,挖土方、架桥梁、修建车站票房、营房、看守房等。因有吃苦耐劳的华工参加建设,到 1897 年,西段已修至伊尔库茨科,同年东段的乌苏里铁路亦已竣工,贝加尔环湖铁路工程于 1905 年修建完毕,最后一段(从斯柳迪扬克到哈巴罗夫斯克)工程于 1916 年竣工。^{[8]131}从 1892~1916 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全线贯通,先后有大约 20 万华工在筑路工程中从事最艰苦的劳动。^{[13]1800}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为俄国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社会经济架设起了快速发展的桥梁。正如美国史学家乔治·伦森指出的那样:“再也没有别的东西能象贯穿西伯利亚的铁路那样象征着西伯利亚机器时代的到来。这条铁路像铁链一样把欧洲和亚洲连接起来,它使东方地区的移民和经济发展起了革命性的变化。”^{[8]185, 186}而作为修建该铁路的主要承担者——华工对此洒尽了汗水,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第四;工商企业的振兴与发展;到 20 世纪初,俄远东地区的工业企业有了长足的进步。阿穆尔省 1906 年有工厂 424 家,产值 525 5 094 卢布,工人 2 322 人。1910 年工厂增加到 892 个,产值达到 8918720 卢布,工人 4173 人。滨海省 1906 年有工厂 1007 个,1910 年增加到 1280 个,产值从 3208800 卢布增加到 9809700 卢布,工人从 4 273 人增加到 6 100 人。此时,阿穆尔省和滨海省成为俄国最大的木材加工和外

运基地。俄政府从中获取了巨额收入。^{[2]22}这些工业成就同样与大量赴俄华工的参与及辛勤劳动分不开。特别是远东地区商业企业的振兴与发展更要归功于华侨的贡献。仅以远东的海参崴和双城子为例,“1909 年,海参崴之商店,俄人 99,华侨 447,1910 年俄人 181,华侨 625。双城子自 1883 年以来破产或停业之俄人商店有 20 家,然继其后有华侨商店 694 家出现。”^{[4]20}19 世纪 90 年代,在海参崴已出现年交易额 10 万到 15 万卢布的中国商号。在阿穆尔省的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中国人经营的大小商号有 500 余家,其中最大的三家商号为广东人经营的华昌泰和山东掖县人经营的同永利和永和栈。^{[6]136}以上资料表明,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可谓没有远东的华侨,就没有远东地区的商业。总之,华侨对俄国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

[参考文献]

- [1] 池子华. 中国流民史·近代卷 [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1.
- [2] 华侨华人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 华侨华人百科全书·历史卷 [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2.
- [3] 李长傅. 中国殖民史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37.
- [4] 李长傅. 中华民族之国外发展 [M]. 国立暨南大学南洋文化事业部, 1929.
- [5] [俄]伊凡·纳达罗夫. 北乌苏里边区概要及其他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 [6] 张宗海. 远东地区世纪之交的中俄关系 [M].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 2000.
- [7] 黑龙江省黑河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工作委员会. 旅俄华侨史料选 [M].
- [8] 汪晓菊. 俄国东部移民开发问题研究 [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9] 陈翰笙. 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1.
- [10] 丁进军. 宣统年间华侨经商佣工史料.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 [11] 陈里特. 欧洲华侨生活 [M]. 海外月刊社编印, 1933.
- [12] 李永昌. 旅俄华工与十月革命 [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1988.
- [13] 李明欢. 欧洲华侨华人史 [M].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2.

[责任编辑 王 桃]